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4.03.007

大学生网络欺凌受害体验:情绪、应对与恢复

■ 唐贞妮 刘 柳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社会学院,南京 210008)

【摘要】 日益频发的网络欺凌受害事件正严重威胁着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与身心健康。然而,既有研究较少关注这一群体遭受网络欺凌之后的受害体验。鉴于此,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基于对20名自我报告为网络欺凌受害者的在校大学生的深度访谈,本研究展示和分析了大学生在经历网络欺凌时的情绪状况、应对策略与感受以及此后的恢复情况。研究发现,大学生在经历网络欺凌后的情绪并非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他们在遭遇网络欺凌之初,普遍因对网络风险预判不足而表现出“诧异”情绪;在网络欺凌事件发生过程中,大学生陷入“独自面对”的应对场景,虽会采用刻意回避与积极回应两种行动策略,但都感受到了“无奈”;在网络欺凌结束后,受害大学生大部分在社交态度与心理状态方面受到持续负面影响,且难以获得他人的有效支持。总之,网络欺凌受害者遭遇欺凌后的情绪状态是一个动态且复杂的历时性变化过程,且其情绪的转变受到欺凌事件不断发展变化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 大学生 网络欺凌 受害体验 情绪应对

一、研究背景

迈入数字时代的今天,校园欺凌等传统欺凌行为逐渐向网络社区蔓延,进而演变出一种新的欺凌形式——网络欺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调查显示,当前网络欺凌正在全球互联网中普遍发生^①。作为全球互联网用户规模最大的国家,我国也难逃例外。频发的网络欺凌已成为我

收稿日期:2024-03-16

作者简介:唐贞妮,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传播与社会;

刘 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越轨行为、健康与心理健康。

^① 具体参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项调查, <https://news.un.org/zh/story/2019/09/1040652>

国青少年在使用互联网时面临的^①最大风险。已有研究表明,网络欺凌事件不仅影响着网络欺凌受害群体的日常生活,还会进一步威胁到该群体的身心健康,严重者甚至可能产生自杀倾向和反社会行为^[1]。因此,网络欺凌已成为与互联网使用密切相关的全球性健康议题,并因其在年轻网民群体中尤为高发的特点,正被视为阻碍青少年健康成长与发展的一大威胁^[2]。

我国对未成年群体的校园欺凌与网络欺凌问题关注已久,但却相对忽视了遭受网络欺凌的另一重要群体——大学生。2013年发布的《穗港澳青少年网络欺凌调查报告》显示,高达68.9%的18-24岁受访者在一年之内有过一次及以上的网络欺凌受害经历^②;2022年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调查进一步指出,超七成受访大学生自认为受到网络暴力的影响^③。遗憾的是,尽管经历网络欺凌已成为我国大学生学习生活中较为普遍的问题,但我们的社会对网络欺凌的整体认识还比较模糊,尤其是针对大学生中网络欺凌受害者群体开展的相关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例如,我们尚不清楚目前我国大学生群体遭遇网络欺凌的具体情况,对该群体遭受的心理创伤了解甚少。与此同时,虽然当下网络欺凌已经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跨文化现象,且其发生特点具有跨文化共性^[3],但也有研究指出,不同社会文化取向会深刻影响着当事个体的应对策略选择^[4]。由此,也进一步启发了本研究的问题意识,即遭遇网络欺凌的中国大学生是如何应对网络欺凌的,他们又随之产生了怎样的心理情绪变化?关注我国大学生的网络欺凌受害情况与体验,对于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下的网络欺凌问题及其对受害者带来的心理健康影响意义重大。鉴于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我国大学生中网络欺凌受害者的受害体验展开探索式研究,重点关注他们在遭遇网络欺凌之后的情绪状况、应对策略与感受以及此后的恢复情况,以期能为解开上述迷思做出些许推进,并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此现象的关注。

二、文献梳理

笔者梳理网络欺凌的相关文献后发现,国内外学术界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两大倾向。倾向之一,现有研究集中于探究未成年群体的网络欺凌现象,对大学生网络欺凌议题的考察尚有进一步补充的空间。国内外学者目前对网络欺凌的研究大多都集中于青少年群体^[5-12],普遍认为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面临着比成年人更大的网络欺凌风险。尽管有研究指出,刚成年不久的大学生也面临着较大的遭遇网络欺凌的风险^[13],但在网络欺凌研究领域,对大学生群体的关注仍然处于探索状态。倾向之二,现有研究侧重于对网络欺凌的定义^[14-16]、网络欺凌与传统校园欺凌的比较^[17-19]、网络欺凌的成因^[20-23]等方面的考察,聚焦于网络欺凌受害者主观体验与感受的研究有待进一步丰富。

当我们将视线聚焦于学术界关于网络欺凌受害者受害状况的研究时发现,现有的中外研

① 具体参见环球网关于《中国青少年互联网使用及网络安全情况调研报告》的相关报道, <https://tech.huanqiu.com/article/9CaKrnK8Ut0>

② 具体参见香港游乐场协会、广州市青年文化宫、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于2013年11月联合发布的《穗港澳网络欺凌调查报告》,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0612/114344001.shtm>

③ 具体参见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面向全国高校大学生展开的问卷调查, <https://mp.weixin.qq.com/s/T6hVX-iMv3nCK6FUQt9PYg>

究主要围绕着受害者的心理健康状态和应对方式展开考察。在关于网络欺凌受害者心理健康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遭受过网络欺凌的青少年展开问卷调查,指出网络欺凌正威胁着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遭受网络欺凌的青少年会产生高抑郁水平^[24-25]、社交焦虑^[26]、持续性失眠^[27]、自杀意图^[28-30]、低自尊^[31-32]等负面心理健康状况和问题。还有研究进一步考察了受害者在经历网络欺凌后心理创伤的持续时间,认为网络欺凌对受害者的负面影响是较为持久的,且这种创伤将会使网络欺凌受害者在未来更有可能变成网络欺凌者,或成为新一轮网络欺凌的受害者^[33-35]。

而关注网络欺凌受害者应对方式的既有研究则多侧重于考察个体的应对策略和应对态度。技术性应对策略被认为是网络欺凌受害者用来规避未来受害风险的常用策略,这类策略主要包括对即时消息和电子邮件等可能留下的网络账户信息进行严格的个人隐私设置^[36-38],或通过更改用户名和电子邮件地址等方法改变个人的互联网身份^[39-40],以及通过屏蔽功能切断与欺凌者的联系^[41]。不过,对于受害者采用这些技术性应对策略以降低未来受害风险的有效性尚不明确,仍然有待考证。此外,已有研究也发现,网络欺凌受害者较少持消极态度来处理个人遭受的网络欺凌攻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主动、积极的应对态度。例如,一项覆盖多个国家网民的互联网在线调查显示^[42],只有约四分之一的网络欺凌受害者表示自己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回应自己的被欺凌经历。而另一项研究则证实,使用回避策略的网络欺凌受害者更有可能经历抑郁^[43]。当受害者主动应对网络欺凌时,大约有15% - 35%的未成年人会告诉网络欺凌者停止攻击,且以告知父母作为吓退欺凌者的手段,但事实上他们并不会真正向父母寻求帮助^[44-46],向朋友寻求支持和建议成为青少年的惯常选择^[47-49]。同样,不告知父母的做法也在大学生群体的相关研究中得以揭示^[50]。既有研究发现,受害大学生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他们认为寻求父母的帮助会显得自己还未成熟,在他们看来,学习如何有效地管理互联网使用中出现的问题是一个成年人必要的技能^[51];另一方面,他们还担心主动告知、寻求帮助会导致自己被父母限制使用互联网。因此,对大学生而言,学会更好地自我处理和解决个人受害问题才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52]。但遗憾的是,目前对于大学生群体遭遇网络欺凌时的具体行动策略尚未明确,仍有待相关研究加以补充。

整体而言,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在网络欺凌受害者的心理状况、应对策略等方面都已进行了扎实的学术考察,且现有研究大多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展开。网络欺负量表(Cyber Bullying Inventory, CBI)、修订版网络欺负量表(Revised Cyber Bullying Inventory, RCBI)和再修订版网络欺负量表(Revised Cyber Bullying Inventory II, RCBI - II)^①在网络欺凌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使用^[53-55]。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研究为丰富对网络欺凌受害者的整体认识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尚可商榷的是,采用事先设定项目因子的结构化量表,在一定程度上很难避免研究者“先入为主”的主观偏见;且结构化量表得到的多属概括性结论,难以获得对受害者情绪的动态认识。正是在此意义上,“从内部”探索现象的质性研究方法为进一步深入探究网络欺凌受害问题带来了新的可能^[56]。该方法强调参与者自身对所研究现象的理解和解释^[57]。

^① 此处提及的量表均为中外学界考察网络欺凌时广泛使用的量表,此处“网络欺负”与本文“网络欺凌”均指 Cyber Bullying。考虑到国内既有心理学文献习惯将其命名为“网络欺负量表”,因此本文遵照学界规范,保留常用命名。

通过将话语权还给受害大学生,能够最大程度地展现个人在受害过程中的情绪反应与心理状态;在非预设的研究推进中,进一步获得对遭遇网络欺凌全过程的细腻认识。而这也是本研究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基于大学生遭遇网络欺凌后的亲身体验,展现网络欺凌对受害者心理情绪状况的影响;从而使这部分被相对忽视的特殊群体的真实境况被呈现出来,以唤起社会各界对网络欺凌现象及被害者群体的关注。

三、研究方法

基于研究目标,本研究最终被确定为一项使用质性研究方法的探索式研究,且在大学生网络欺凌受害者群体中展开。具体而言,本研究使用目的抽样法选择了20名自我报告为网络欺凌受害者的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并对他们进行了一对一的半结构式访谈。研究者通过在核心用户年轻化且用户间交流互动较为频繁的豆瓣APP中发布招募通知,共吸引了8位受访者参与研究;另通过校园招募启事吸引到10位受访者;还有2名受访者是经其他受访者推荐而来。本研究的20名研究对象均为“自我报告是网络欺凌受害者”的大学生。其中,17人为女性,3人为男性。这些受访者均为国内公办一本院校学生,就读年级从大一跨越到研一。在专业背景方面,就读于人文社科专业的大学生11人,就读于理工科专业的3人,剩余6人未透露自己的专业信息。

数据收集,即半结构式访谈,依据受访者的意愿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展开。当受访者愿意与研究者见面进行线下访谈时,研究者通常会选择在安静且无他人存在的环境中、以一对一的形式完成面谈;每次线下访谈的时长约60分钟。而当受访者由于各种原因不愿意面谈时,研究者则会在微信中以文字对话、视频聊天与发送语音的方式完成一对一的线上访谈;每次访谈时长多在80-100分钟之间。所有访谈都在征得被访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了录音,研究者在访谈结束后将录音转为逐字稿以备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工作主要采用了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的路径。主题分析法是一种常用于识别、分析和报告主题的质性数据分析方法^[58]。与扎根理论或叙事分析等方法不同,主题分析法并不依附于既定的程序框架,但也能准确地报告经验、意义和受访者的现实情况^[59]。研究者首先通过对访谈文稿的反复阅读与归纳,获得初始编码。其次,研究者阅读访谈文稿及初始编码,进一步对编码进行重组与整合,并将相应内容归类到已形成的特定类别和主题之中,形成“情绪状况”“应对策略及感受”“恢复情况与恢复历程”三大主题。最后,研究者通过屡次反复阅读文字材料来发掘网络欺凌受害者的真实受害体验并撰写成文。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文在引用受访者访谈记录时隐去了受访者身份信息,并代之以化名。

四、研究发现

网络欺凌受害大学生的受害体验和情绪状况并非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发展的、历时

性变化过程,并与网络欺凌的事态发展紧密相关。这一历时性的情绪变化过程可划分为欺凌之初、欺凌之时与欺凌之后三个阶段。在欺凌刚到来时,大学生往往以“诧异”等疑惑性情绪为开端;随着对网络攻击内容的初步阅读,受害者的情绪反应视个人是否有对现实生活可能遭受影响的预判,而逐渐分化为以“害怕”为代表的内在化情绪与以“生气”为代表的外在化情绪两类。当欺凌事态进一步发展,遭遇不同网络欺凌类型的受害大学生分别采用了刻意回避与主动回击两种行动策略;但无论采用何种应对方案,大学生最终都在独自面对欺凌的情况下陷入了“无奈”的相似情绪中。在欺凌攻击停止后,受害者们的社交态度与心理状态均在较长时间内受到网络欺凌事件的负面影响。

(一)欺凌到来:手足无措的“我”

“惊慌”与“诧异”等疑惑性情绪是绝大部分受访者在遭遇网络欺凌事件之初的第一反应。除1名受访者在访谈中表示自己在社交平台公开发言前就“想到了自己可能会被喷,早就做好心理准备”(王伟)以外,另外19名受访者都坦言自己在上网时并不想主动挑起争端,事发之前也从未想过自己在网络中“看似平常”的评论,或是线下“看似平常”的日常行为会在互联网中招致如此“可怕的”后果。因此,当大部分受访者在无意间打开手机软件时,个人社交平台主页突然涌入的“红点”(指社交平台的用户新消息提醒)让他们感到非常惊慌。一位受访者这样说道:

*** (某明星)这个就是其中一次。那是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发完(那条微博)就去睡觉了,醒来看到一百多条消息提醒。我当时整个人都慌了,怎么会有这么多消息。(石瑞)

伴随着“惊慌”“诧异”的第一反应,在受害大学生陆续查看消息内容后,他们的心理状态又逐渐分化为两种情绪倾向。一类是以“崩溃”“害怕”等为代表的内在化情绪反应,另一类是以“生气”“愤怒”等为代表的外在化情绪反应。

受访者产生第一类内在化情绪反应大多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顾虑相关。有部分受访者坦言,因为遭受了来自网络中的陌生人欺凌,他们十分担心这种欺凌会超越网络限制并进一步恶化,从而影响自己线下的现实生活。例如:

他们就在底下评论开始挂我(指发布恶意攻击受害者的评论或对受害者的照片进行恶意修图等,下同),用我以前发过的自拍,就开始挂我、人身攻击。我看到真的就吓死。他们还在“超话”(指微博的“越级话题”社区)里面挂我,真的把我吓到了。因为我那时候最害怕就是他们挂我、挂学校,就是那种恐惧。我就很紧张,(担心)万一上个厕所(就把我扒出来了怎么办),就很害怕。(亚美)

另有部分受访者则表示自己是因为遭遇线下熟人在网上突然转变态度、针锋相对而心生恐惧,并对彼此间既有的线下日常社交关系产生了怀疑。一位参与本研究的大学生这样说:

平时和你朝夕相处的同学,平常什么都说、推心置腹的,但他们突然用那么恶毒的话来诅咒你、骂你,甚至是没有的事情他们都可以虚构和捏造出来……我通过头像发现其中有个人是我大二的学弟。我首先感到的是震惊,其次是失望和恐惧……那种打击是非常大的。(可欣)

而另一类遭遇网络欺凌后被“生气”“愤怒”“烦躁”等外在化情绪充斥的大学生,则主要是受到了来自网络中偶遇的陌生人的网络欺凌,他们在遭遇网络欺凌之初并未意识到网络欺凌可能

会给自己日常生活带来的风险和麻烦。如：

最开始就是非常愤怒,真的,我当时真的超级生气,巨烦躁……就发现这些人就像疯了一样,他们不是解决问题的,而是借这个问题去“口嗨”(网络流行语,指逞一时口舌之快),去攻击侮辱学生,无非就是想拉你下水……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慧慧)

(二)卷入“被欺凌”的漩涡:沉默与回击后的“无奈”

遭遇网络欺凌后,参与本研究的大学生采取了刻意回避与主动回击两种不同的应对策略,欺凌事件的后续发展也因个体采用的两种差异化行动策略呈现出不同的走向。总体而言,在欺凌发生过程中,大学生均遭遇独自面对的境况,并最终陷入“无奈”的情绪中。

1. 刻意回避:“沉默”后的不了了之

部分受访者在遭遇网络欺凌后采用了刻意回避的应对策略,他们选择对欺凌行为“不予理会”,希望通过回避让自己尽快摆脱网络欺凌者的侵扰。值得关注的是,刻意回避的“沉默”策略往往更多被遭受线下熟人网络欺凌的大学生采用。在本研究的7名遭遇此类网络欺凌的受访者中,除1名在访谈中表示自己曾试图发微信向欺凌自己的线下熟人主动澄清、解释以外,其余6名均选择了不直接回应的方式来处理此事。他们大多会采用迅速将对方从微信好友列表中删除、更换手机号等技术策略试图切断联系(如沫凡、余双),或是以更被动的“沉默”来应对熟人的网络欺凌(如可欣),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尽快摆脱欺凌者的侵扰。

当进一步问及采用回避策略而非积极回击来应对网络欺凌的原因时,依据提到的顾虑因素的不同,可将受访者大致划分为三类。第一类表示自己并不是不想反击,只是结合自身的实际“应战水平”考虑后,认为自己并不善于回击,就像受访者雯雯所说:“主要是我也不怎么会骂人,如果我会骂人,肯定会骂他们的”。第二类认为自己这样做主要是出于“这样只会越描越黑,不想事情闹大”(余双)的考量,“息事宁人”是他们所认为的最好解决办法。第三类表示自己这样做是因为觉得“对不认识的人没有任何必要,反正事情过去了就没事了”(顾爽),他们并不想将精力“浪费”在这件事情上。

但遗憾的是,网络欺凌事件尽管最终大多会因为受害者在网络空间中的回避走向尾声,但却是以受访者诸如“永久切断与那个圈子朋友的联系”(余双)或者“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碰过那个游戏”(羽然)等略带无奈的牺牲为代价的。在这些受害者看来,只有通过既有社交网络的“断联”和在受害网络平台的“退场”,欺凌事件才能够最终得以“不了了之”。

2. 积极回击:“单打独斗”的灵活策略

研究显示,更多的受害大学生在遭遇网络欺凌后更倾向于采取主动回击的行动策略。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表示,“以理服人”是自己遭到网络欺凌后的首选回击方案。他们除了会试图为自己遭遇欺凌的观点进一步解释、说明,以期说服欺凌者之外,还会使用自己专业所学和日常知识积累,用法律条文警告对方“已经侵权”,希望拿起“法律的武器”制止对方进一步欺凌。正如以下这位受访者所言:

他们在我微博里翻出了我的照片,使劲骂我。我警告他们这是侵犯肖像权的行为。结果她告诉我她问过学法律的男朋友了,说这不算侵权。我只好把界定侵犯肖像权的条文截图发给她,然后她就删了。(丽娜)

不过,“以理服人”的策略往往很难奏效,尤其是遭受网络陌生人的欺凌时,他们的积极澄清、耐心解释反而会引发欺凌事件的进一步恶化,进而遭受欺凌者更过分的欺凌。如:

当时一个姑娘来给我评论说图是她画的,我回她“不要撒谎了行吗?”她直接跑来私信中语音骂我。虽然我耐心解释了为什么可以看出不是她画的,但她还是狂发语音骂我,骂完之后把我拉黑让我没法回,还发了条微博@我说“我把你拉黑,回不了了”。(石瑞)

面对欺凌者的进一步侵扰,一些大学生逐渐将“以理服人”的策略搁置一旁,转而选择“以牙还牙”。例如,通过“对骂”进行反击,“就对骂呗,他们怎么骂我们,我们就怎么骂回去”,受访者慧慧这样说。但当发现“以暴制暴”的策略收效甚微时,他们又会将策略从“改变欺凌者态度”转变为“主动退场”。他们使用关闭私信、禁止评论、加入黑名单等技术性应对手段试图让自己摆脱欺凌,甚至采用注销个人社交账号、卸载软件等方式让自己远离被欺凌的负面网络环境。

遗憾的是,尽管这部分受害者在面对网络欺凌时采用了较为主动积极的回击策略,但在整个过程中始终是以“单打独斗”的形式应对突发的网络欺凌事件。当遭遇欺凌时,仅有1名受访者表示自己联系了学校,但也仅仅是表达“希望学校帮忙删除论坛里面的帖文”(笑笑)的诉求;另有1名受访者透露自己第一时间使用了“举报”功能希望寻求社交平台的帮助,但对于平台举报对制止对方欺凌行为的有效性,受访者表示“并没有什么用”(李明)。除此之外,其余受访者都表示在自己应对网络欺凌的过程中并未试图向他人寻求帮助。

随着欺凌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在欺凌者持续不断的评论、电话骚扰、私信辱骂等攻击中,即便采取主动回击策略的受访者也变得非常“无奈”,因为“他们(指欺凌者)一直穷追不舍,你想好好解决,但是对方未必是这样,有种无力感,就像你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一样”(黄强)。

由此可见,无论网络欺凌受害者采用了何种应对倾向与行动策略,在欺凌事件的演化发展中,“单打独斗”的受害者们最终又会殊途同归地陷入对遭遇欺凌的现实“感到无奈”的情绪状态中。

(三)欺凌之后:艰难的自愈

尽管欺凌攻击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消失,但网络欺凌给受害者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是持久深远的。访谈中有15名大学生透露,这段糟糕的经历一直伴随着他们的生活,他们在其中煎熬的时间最短的为一周(如石瑞),最长的已持续了近五年(如慧慧)。但为了尽可能让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看上去“一切如常”,他们往往会刻意地“隐藏情绪”,这种做法在遭受线下熟人网络欺凌的大学生中被数次提及。例如:

现在我基本不会说这个事情,不是觉得已经过去了,而是不想提了,我周围人都不知道我现在的这样的,一到晚上反正我就失眠、睡不着。今天是我第一次说,在此之前我(和)谁都没说过。(丽娜)

网络欺凌对受害大学生的持久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交态度与心理状态两个方面。一方面,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的社交活动中,绝大部分受访者都透露自己自从遭遇网络欺凌后就变得“小心”“谨慎”起来。部分受访者表示,他们开始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变得有意识地克制或完全拒绝表达个人观点、看法和情感,只有当“看到大家有一致的声音了,才会觉得比较安全,才会发

表一下(意见)”(李明)。甚至,也有受访者选择从此不再在公开的互联网社交平台发布或分享任何与个人线下真实信息相关的内容,希望能够在网络中尽可能地保护个人隐私,例如采用“不发微博”(黄强)的极端方式彻底“隐藏”自己的线下生活。还有一些受访者更为“小心”地彻底“退出”了欺凌发生的平台,以远离不愉快的欺凌经历带来的心理创伤(如羽然)。同样的社交态度转变也发生在受害大学生的线下社交生活中。有部分受访者表示,他们在交友方面变得更加保守和审慎,且不再愿意轻易相信他人。这种转变倾向在遭遇熟人网络欺凌的受访者中更为明显,有一位受访者这样说道:

从那件事(指遭遇网络欺凌)后我就不会去轻易地交朋友,就是跟别人的关系特别贴近的那种交往(是不会的)。正常的交往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绝对不会出去旅游,就是不会有两个人在一起很亲昵的那种(交往)。也不会把自己的联系方式轻易地给别人,会稍微设防。(宇航)

另一方面,除了线上线下社交态度转变以外,不稳定的心理状态也会因为遭遇网络欺凌而持续性地困扰着受害大学生。自述仍未从欺凌受害中恢复的受害者表示,他们因经历网络欺凌而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一旦再次看到与欺凌事件相关的事物,“难过”“不舒服”等心理感受就会再次涌上心头。例如:

因为我看见那些照片,(就会想到)哎呀,就是因为这张照片(我曾经被人)这样骂过,心里就会非常不舒服,我再看到它们还是非常不舒服……因为看这些照片,我就可能会想到那件事情(指网络欺凌事件)。(顾爽)

更为遗憾的是,有两名仍未从网络欺凌中恢复的大学生自述已经因此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健康障碍。其中一人在受访时表示,她目前仍然处于抑郁状态下,人变得敏感、多疑,时常“怀疑别人在背后骂自己”(沫凡)。而另一名大学生则透露,她后来因此陷入情感障碍的困境中,情绪的起伏已经对她的日常学习、生活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日常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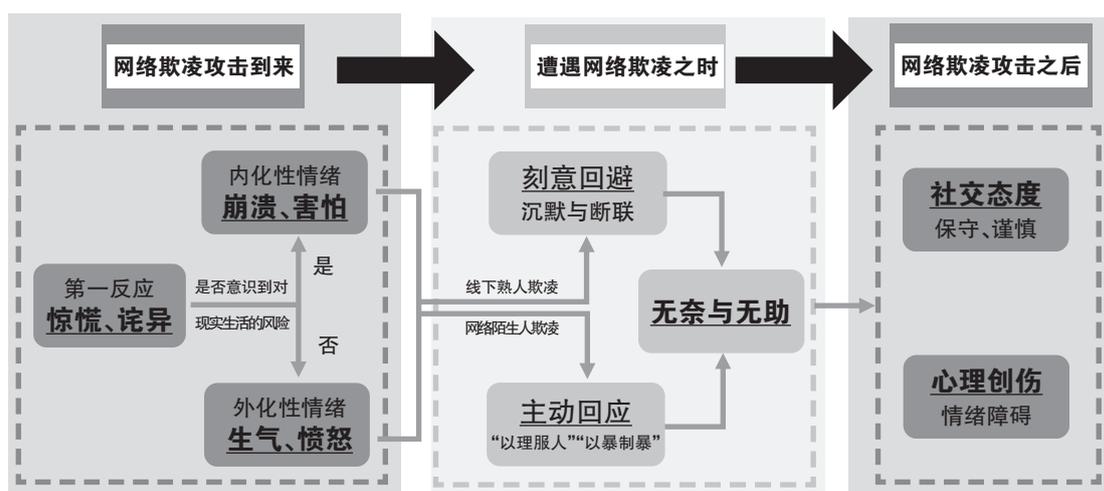
我到现在都特别害怕……我的新微博只加了几个关系特别好的人,还有一些xxx(某明星)的粉丝,就没有别人能看到。我现在也都不怎么发朋友圈和QQ……我要么就写日记,要么就发到(新)微博上。昨天晚上2点钟起来,发了好多条微博,但都是些毫无逻辑性的话,反正睡不着,就发好多(这种微博)……我真的控制不住自己。(亚美)

由此可见,对于大部分受害大学生而言,因遭受网络欺凌而产生的心理创伤很难在短时间内痊愈。当欺凌发生后,如何减轻、消解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随即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难题。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初步探索了网络欺凌受害大学生在欺凌事件发生时与发生后的情绪状况、应对策略、感受以及恢复情况与恢复历程。与以往的研究结论有所区别,本研究发现网络欺凌受害者遭遇欺凌后的情绪状态是一个动态且复杂的历时性变化过程,且情绪的转变受到欺凌事件发展变化的深刻影响(情绪变化情况详见下页图)。这一研究发现的差异可能主要与研究采用的方法有关。既有研究大多以结构固定的定量问卷展开测量^[60-61],本质上带有将网络欺

凌受害情绪视为静态结果的研究预设,相对忽视了网络欺凌事件动态演变的复杂性,由此带来了较难从纵向层面揭示网络欺凌事件发生全过程中受害者情绪演变情况的研究局限,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忽视事件亲历者主观体验的视角遗憾。本研究通过采用强调受访者主体性的质性研究方法,揭示了当事人在欺凌事件发生过程中的真实状态,获得了对欺凌事件全过程中受害者情绪与心理变化的整体性认识。本研究的发现表明,网络欺凌受害并不仅仅是一个基于结果导向的横截面状态,而是一个动态事件演变过程。对于网络欺凌受害群体而言,其情绪反应、行动策略都将随着网络欺凌事态的演进呈现出历时性变化。随着个体能动性的发挥,欺凌事件也将随着受害者的策略变化而产生不同的发展走向,这又将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个体的主观体验。此处,需要强调的是,在已有相关研究扎实的学术发现之上,本研究力图进一步呈现网络欺凌受害者情绪状态的动态维度,从而形成理解中国社会语境下网络欺凌受害者情绪状况的又一可能。



网络欺凌受害大学生情绪状况变化历程图

在情绪反应方面,当面对网络欺凌时,大学生不约而同地以“诧异”“惊慌”等情绪作为第一反应,这是本研究获得的主要发现之一。性格迥异的个体面对突发的网络欺凌事件却表现出了相同的疑惑与担忧,反映出大学生群体普遍存在着对网络欺凌的认识程度不够,尤其对其严重程度预判不足的严峻现状。已有研究表明,个体成为网络欺凌受害者的可能性主要与其在互联网中参与活动的危险性有关,透露个人真实信息、分享照片、结识陌生网友等高危型互联网风险活动都将提高个体在互联网中遭遇网络欺凌的风险^[62]。当大学生对互联网风险的预判意识不强时,他们成为网络欺凌受害者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而一旦受害,他们将遭受长时间的心理创伤,并严重影响该群体学习和生活,甚至还可能导致他们成为新一轮的网络欺凌者或继续成为新的网络欺凌事件的受害者^[63-65]。因此,正如事前预防对于减少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和影响的重要性一样,当前高校应当重视对大学生群体的互联网风险普及工作与网络欺凌相关知识教育,以预防该群体网络欺凌事件的发生以及减少大学生在遭遇网络

欺凌事件时的负面影响。

此前国外的相关研究指出,受害者在应对网络欺凌时主要采用主动、积极的应对态度并付诸相关行动^[66]。而本研究基于对中国网络欺凌受害大学生的探索性调查初步发现,除了主动回击之外,消极回避也是中国大学生在面对网络欺凌时会采用的应对策略,而他们采用何种回应态度和策略与其所遭受的网络欺凌的类型有一定的关联。当遭遇线下熟人在网络中实施的欺凌时,大学生大多会选择消极回避;而当其受到的欺凌来自网络中的陌生人时,他们往往更倾向于以主动、直面的态度加以回击。此外,本研究也在此前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网络欺凌受害者采用主动积极的应对方案并不仅仅局限于主动告知欺凌者停止攻击^[67-69],而是随着网络欺凌事件的发酵、攻击时间的延长,一些受害者有可能从“以理服人”转变为采取“以暴制暴”的行动策略。这一研究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网络欺凌受害者可能会成为新一轮的网络欺凌者或“网络欺凌—受害者”的既有结论^[70-72]。当然,以上发现仍需未来进一步研究。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网络欺凌受害大学生在欺凌发生过程中始终处于“单打独斗”的应对场景中,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基于这一发现,本研究建议,未来在构建网络欺凌受害大学生的社会支持系统时,网络社交平台应当被作为重要支持主体纳入其中。国外此前相关研究发现,未成年网络欺凌受害者普遍不会向父母寻求帮助,但大部分人会向朋友寻求支持和建议^[73-77]。本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在遭遇网络欺凌的过程中也不会向父母寻求帮助,同时,他们也并未提及向朋友寻求帮助的经历,但他们却有向网络社交平台寻求支持的尝试。可见,对于涉世未深的大学生而言,向平台求助是他们在网络欺凌发生时能想到的最便捷的解决办法,但“举报”的方式对于制止网络欺凌而言收效甚微,平台的跟进效率也不尽如人意。事实上,网络社交平台对于网络欺凌受害者的支持意义重大。首先,通过限制陌生人私信次数等功能设置,平台能够将网络欺凌事件扼杀在“摇篮”中,为预防网络欺凌做出贡献;其次,网络社交平台可以通过建立专门的事件援助通道,在受害者求助时第一时间通过技术设置“切断”欺凌者与被欺凌者之间的平台联系,最大程度减轻受害者可能遭受的创伤;最后,网络社交平台具有的用户数据读取优势,也能够为受害者后续重建互联网社交提供帮助。在网络欺凌频发的当下,网络社交媒体平台应当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加强对网络欺凌事件的关注与介入,以此构建更为有效的网络欺凌受害者社会支持系统。

总体而言,本研究的发现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大学生网络欺凌受害情况的认识,揭示网络欺凌受害者的真实情绪体验与个人困境,对介入网络欺凌事件、更精准地为网络欺凌受害者提供有效支持具有一定启示意义。由于仅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较小的样本量可能导致对大学生网络欺凌受害者群体的认识与了解程度仍停留在探索层面,对网络欺凌受害因果机制的探讨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从作为行动者的媒介与欺凌主体的互动视角考察网络欺凌现象,或许也可考虑进一步考察中国社会文化对网络欺凌事件的影响。本研究抛砖引玉,期待未来有更多关于该领域的深入研究能够进一步丰富对网络欺凌现象的认识,唤起更多社会主体对网络欺凌现象的关注与介入,避免更多互联网使用者卷入网络欺凌的漩涡之中。

[参 考 文 献]

- [1][13][23][62] Chen, L., Ho, S.S., Lwin, M.O.. A Meta - Analysis of Factors Predicting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and Victimization: From the Social Cognitive and Media Effects Approach, *New Media & Society*, 2017, (8).
- [2][3] Goerzig, A., Frumkin, L.. Cyberbullying Experiences On - the - go: When Social Media can Become Distressing, *Cyberpsychology*, 2013, (7).
- [4] Hu, Q., Bernardo, A.B.I., et al.. Individualism - collectivism Orientations and Coping Styles of Cyberbullying Victims in Chinese Culture, *Current Psychology*, 2018, (1).
- [5][20] 肖 婉 张舒予:《国外网络欺凌研究热点与实践对策——基于 Citespace 知识图谱软件的量化分析》,载《比较教育研究》,2016年第4期。
- [6] 谢家树 魏宇民 ZHU Zhuorong:《当代中国青少年校园欺凌受害模式探索:基于潜在剖面分析》,载《心理发展与教育》,2019年第1期。
- [7] 周书环:《媒介接触风险和网络素养对青少年网络欺凌状况的影响研究》,载《新闻记者》,2020年第3期。
- [8][27] Kubiszewski, V., Fontaine, R., et al.. Cyber - bullying in Adolescents: Associated Psychosocial Problems and Comparison with School Bullying, *L'Encephale*, 2013, (2).
- [9][24] Landoll, R., La Greca, A., Lai, B.. Aversive Peer Experiences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Networking - Peer 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 (SN - PEQ),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013, (23).
- [10][31][61] Brewer, G., Kerslake, J.. Cyberbullying, Self - Esteem, Empathy and Lonelines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5, (48).
- [11][25][60] Selkie, E., Kota, R., et al.. Cyberbullying, Depression, and Problem Alcohol Use in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A Multisite Study,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2015, (2).
- [12][26] Fahy, A.E., Stansfeld, S.A., et al..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Cyberbullying Involvement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2016, (5).
- [14][42][46][66][69] Patchin, J., Hinduja, S.. Bullies Move beyond the Schoolyard: A Preliminary Look at Cyberbullying, Youth Violence and Juvenile Justice, 2006, (2).
- [15][38][40] Smith, P.K., Mahdavi, J., et al.. Cyberbullying: Its Nature and Impact in Secondary School Pupil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008, (4).
- [16] Langos, C.. Cyberbullying: The Challenge to Define,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2012, (6).
- [17] Zhou, Z., Tang, H., et al.. Cyberbullying and Its Risk Factors among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2013, (6).
- [18] Beckman, L., Hagquist, C., Hellstrom, L.. Discrepant Gender Patterns for Cyberbullying and Traditional Bullying——An Analysis of Swedish Adolescent Data,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3, (5).
- [19] Rafferty, R., Vander Ven, T.. "I Hate Everything about You": A Qualitative Examination of Cyberbullying and On - Line Aggression in a College Sample, *Deviant Behavior*, 2014, (5).
- [21] 赵宝宝 金灿灿 吴玉婷:《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网络欺凌的影响:链式中介效应分析》,载《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8年第6期。
- [22] Chang, F., Chiu, C., et al.. Online Gaming and Risks Predict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and Victimization in Adolesc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15, (2).
- [28] John, A., Glendenning, A., et al.. Self - harm, Suicidal Behaviours, and Cyberbullying in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Systematic Review,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018, (4).
- [29] Litwiller, B.J., Brausch, A.M.. Cyber Bullying and Physical Bullying in Adolescent Suicide: the Role of Violent Behavior and

- Substance Us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13, (5).
- [30] Schenk, A.M., Fremouw, W.J., Keelan, C.M..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Cyberbullie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3, (6).
- [32] C é nat, J.M., H é bert, M., et al.. Cyberbullying,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Self – Esteem among Youth in Quebec School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14, (17).
- [33][63][70] Beran, T.N., Rinaldi, C., et al.. Evidence for the Need to Support Adolescents Dealing with Harassment and Cyber – Harassment: Prevalence, Progression, and Impact,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2012, (5).
- [34][64][71] Schenk, A., Fremouw, W.. Prevalence, Psychological Impact, and Coping of Cyberbully Victim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 2012, (1).
- [35][65][72] Wong – Lo, M., Bullock, L.M., Gable, R.A.. Cyber Bullying: Practices to Face Digital Aggression, Emotional and Behavioural Difficulties, 2011, (3).
- [36][44][47][67][75] Aricak, T., Siyahhan, S., et al.. Cyberbullying among Turkish Adolescents,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2008, (3).
- [37][39][45][51][68][73] Juvonen, J., Gross, E.F.. Extending the School Grounds? Bullying Experiences in Cyberspace, *Journal of School Health*, 2008, (9).
- [41] Muller, R.D., Skues, J.L., Wise, L.Z.. Cyberbullying in Australian Primary Schools: How Victims Differ in Attachment, Locus of Control, Self – esteem, and Coping Styles Compared to Non – Victims, *Journal of Psychologists and Counsellors in Schools*, 2017, (1).
- [43] Völlink, T., Bolman, C.A.W., et al.. Coping with Cyberbullying: Differences between Victims, Bully – Victims and Children not Involved in Bullying,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13, (1).
- [48] [76] Slonje, R., Smith, P.K.. Cyberbullying: Another Main Type of Bullying?,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8, (2).
- [49] [77] Topcu, Ç., Erdur – Baker, Ö., Capa – Aydin, Y.. Examination of Cyberbullying Experiences among Turkish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School Types,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Multimedia and Virtual Reality On Behavior and Society*, 2008, (6).
- [50] Glasner, A.T.. On the Front Lines: Educating Teachers about Bullying and Prevention Method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0, (4).
- [52][74] Agatston, P.W., Kowalski, R., Limber, S.. Students’ Perspectives on Cyber Bullying,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2007, (6).
- [53] Erdur – Baker, O., Kavsut, F.. Cyber Bullying: A New Face of Peer Bullying, *Eur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07, (27).
- [54] Topcu, Ç., Erdur – Baker, Ö.. The Revised Cyber Bullying Inventory (RCBI):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Studies, In O.Hacifazlioglu, M.M.Halat (Eds.),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BV, 2010, pp.660 – 664.
- [55] Topcu, Ç., Erdur – Baker, Ö.. RCBI – II: The Second Revision of the Revised Cyber Bullying Inventory,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in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2018, (1).
- [56] Flick, U..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4th ed),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9, p.505.
- [57] Ritchie, J., Lewis, J..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A Guide for Social Science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3, p.4.
- [58] Boyatzis, R.E.. *Transforming Qualitative Information: Thematic Analysis and Code Development*,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8, pp.vi–vii.
- [59] Braun, V., Clarke, V.. *Using Thematic Analysis in Psychology*,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2006, (2).

(责任编辑:崔 伟)